

論 点 摘 編

内生基因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核”

陆轶之在《长沙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独特国情紧密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合理内核”,中国国情是其“基本内核”。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可以长期不依赖于外面世界而能独立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内生动力,同马克思主义结合构成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核”;中国道路是经历近现代史上的无数次学习和试错过程后的历史选择,是适应中国现代实际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度契合,是中国道路的基本落脚点和最终价值目标。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

余丽在《中州学刊》在2019年第12期撰文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价值逻辑及价值位阶

邵发军在《理论月刊》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规范性的价值共同体,彰显的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一种张力性关系。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张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价值逻辑。与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生成的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抽象性与虚幻性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指向类主体的生命价值、类命运的终极性价值、类意义的人道性价值及其类规范的结构价值,同时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互利共生的存在与共识性的共同价值共同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逻辑及其价值位阶之中。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进民众政治认同的四维逻辑

姚广利在《学习论坛》2019年第12期撰文指出,政治认同逻辑是政治体系输出与政治认同主体心理归属感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原则性规定。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拥护,归结为对执政绩效、法理法治、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等政治认同逻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增进民众政治认同依赖于不断调适此四维逻辑:以新时代历史方位为调适政治认同逻辑的总依循;在执政绩效逻辑方面,以新发展理念深化执政绩效的内涵来保证政治认同;在法理法治逻辑方面,以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法理法治的进程来保障政治认同;在意识形态逻辑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意识形态来引领政治认同;在领袖魅力逻辑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彰显领袖魅力来统合政治认同。新时代,领袖魅力日益成为推动执政绩效、法理法治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统合力量,而执政绩效、法理法治、意识形态则分别发挥着基础、保障、方向作用。

服务型政府的促进型治理: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耿亚东在《治理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依托管理型政府,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管理型政府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信息流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社会治理主体都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随着社会治理中心-边缘结构合理性的逐步丧失,整个社会将要求进行治理模式变革: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进行促进型治理,进而实现政府模式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促进型治理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行动者自治能力的培养,强化他们进行社会参与与自我管理的能力,更强调政府对社会行动者社会责任能力的培育;不仅强调政府的开放性,更强调政府的引导性。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韩万渠在《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李永娜,袁校卫在《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重塑政府、市场、组织与居民构成的治理结构,需要强调“一核多元”之差序性结构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性,并基于此划分不同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

任与角色,理顺它们之间的边界及其互动关系。政府应该扮演社区治理的引导性角色以及资源的调控者,市场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高层次公共服务,社会组织能够弥补政府与市场的缺陷为底层群体提供特殊服务,社区居民则扮演城市社区治理的参与者角色,四大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并形成相互联动、协商、沟通的合作机制。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激活不同主体的能动性,倡导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推进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购买的“项目化运作”,从而实现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精准匹配。

新时代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路径选择

蓝波涛,王新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的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维护文化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制度化体系建设,不断促进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水平。着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新能力,积极开展文化价值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播创新。切实打造和产出精品力作,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之中。这些具体的路径,立足于不同的维度,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路径体系。

高信任、高声誉诉求与民营企业治村中的捐赠行为

杨玉珍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为破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人才瓶颈,我国出台了鼓励城市专业人员、公职人员到农村任职的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企业治村,为深度嵌入村庄而进行的捐赠行为确实推进了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中切实存在的模式,但这种模式自身的可持续性和村庄间的可推广性值得关注。民营企业深层嵌入乡村社会结构需要建构高信任和高声誉体系,高信任和高声誉诉求引发企业家捐赠行为,捐赠行为发生后高信任高声誉产生道德行为和败德

行为两种结果。制度环境信任、不同主体的信任、个人特质及社会声誉诉求引发民营企业捐赠行为。民营企业捐赠行为将产生道德驱动下的不可持续、政治排斥、政府职能缺位与权威合法性转移、企业的行政化与可持续投入压力。但民营企业治村中,可以借鉴的是乡镇政府、原村两委、村民对情感在乡的社会人才给予的信任以及“选人、用人”机制。

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困境与政策支持路径

贺璇在《科学管理研究》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新型研发机构是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与传统科研单位相比,它具有组织目标市场化、组织治理企业化以及组织运行协同化等明显特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理念价值的多元主体间合作和竞争激发了体制机制运行的活力,但新型研发机构发展依然面临着难以实现“身份”认定与分类管理、旧有体制束缚与创新活力不足、扶持力度的不足与支持方式的错位、发展不均衡与资源过度集中化等问题。借鉴国外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规律和经验,我国应从强化科技管理体制、赋予新型研发机构独立运行的地位、完善新型研发机构激励政策体系、引导科研人员向新型研发机构流动以及重点支持与均衡发展等方面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高质量发展视阈下创新型企业集聚对策

李新安在《创新科技》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已成为推动区域竞争力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关键。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双创战略的深入推进,创新型企业集聚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支撑。在目前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加速创新型企业集聚,发挥其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方面的创新集聚示范引领作用,对促进地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及规模提升,显得尤为重要。强化知识产权法规约束,保护创新型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培育集聚的创新文化,营造技术创新的浓厚氛围;建立集聚创新的生态网络,打造技术创新软环境。

构建都市圈时代“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发展新格局

李国英在《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核心城市+特色小镇”的新型城乡融合发展框架将是未来区域发展的方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打破“城市—乡村”二元结构的界限,特色小镇正是结合城市功能与乡村功能的综合体。构建核心城市和特色小镇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要以产业为核心、以特色产业集聚为发展模式,依托都市圈的现有资源,结合自身产业特色,以其特有的属性,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特色小镇作为高端产业发展、高级人才聚集的重要空间载体,其所形成的产业链延伸将带动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并与核心城市形成协作互补的产业链,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城归”现象:价值定位、实践基础及引导趋向

夏金梅,孔祥利在《经济学家》2019年第12期撰文指出,“城归”现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城镇化模式下人口的逆向流动现象。基于城乡等值化和城乡一体化理念,“城归”现象的价值定位体现在农业转移人口的特色路径选择、农村发展新的人口红利形成、资源共享的城乡互助养老等维度。在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流语境下,“城归”不仅是农民工的主观返乡抉择,更是复杂而综合的政策实施和制度变革的客观力量博弈的结果。城乡户籍制度一元化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等都是“城归”现象的实践基础。基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视角,要积极引导“城归”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涉农项目创业的重要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促进高质量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绿色信贷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

李毓,胡海亚,李浩在《经济问题》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绿色信贷作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金融支持,其对第二、第三产业间以及对地区间产业

结构升级是否存在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是产业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引入绿色信贷政策虚拟变量,整体回归后发现:绿色信贷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区域回归后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分产业回归后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蕴含的“倒逼”机制,会对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却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因此,统筹区域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协调发展,构建政府、银行与企业间“绿色”数据的实时对接与共享机制,促进绿色信贷资金在区域间与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是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国家所有”的私权基础及实现路径

郭少飞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宪法上“国家所有”乃全民所有制反映,具有制度保障意义;其私法权利形态多样,不只国家所有权,亦有其他权利,应以“国家财产权”为基。“国家所有”可由权利主体与客体遁入私法。于权利主体,国家法人化,建立以机关法人为核心的公法人体系,完善国家举办设立之法人制度;就权利客体,须厘清国家财产范围,区分财政财产、公用财产、共用财产。由此,在《民法总则》法人规范指引下,新立机关法人法;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分别立法,不论国家举办设立与否,在同一法律中规定。制定国家财产法,构建国家财产基本法律框架;民法典物权编仅保留国家所有权一般条款,现行国家所有权物权法规范纳入特别法。

著作权侵权判断主体的界定

杨红军在《东岳论丛》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知识产权法中,侵权判断主体的界定关系到裁判者应从谁的视角对知识产品之间的相似度进行判定。与商标法和专利法不同,该问题在著作权立法文件中缺乏规定,学术研究中也很少予以关

注,实践中更是存在着类型多样的主体选择,规范性明显不够。相较于其他主体类型,以相关公众作为规范化的单一判断主体可在客观度、邻近度和包容度等维度得到充分的合理性论证。司法实践中,裁判者应聚焦作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个性化特点,充分借鉴包括商标法在内的其他知识产权法中的相应做法,科学、合理、有效地确定作为著作权侵权判断主体的相关公众范围、获取该类主体的认知意见并将其运用到对知识产品相似度的判断之中。

法治文化建设的道德支撑

魏长领,路守通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广义法治文化包括意识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四个方面,狭义的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法治文化的意识层面,包括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理念、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等基本要素。法治文化体现和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从立法的道德审视、执法的道德尺度、司法的道德维度和守法的道德基础四个方面看,道德与法治文化具有内在联系。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将道德融入法治文化,用道德激发法治文化的内在活力,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感,充分发挥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当前我国伦理困境的生成原因及消解策略

宋慧在《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伦理困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社会学理论认为,“异质性”是伦理形成的基础,“不平等”是伦理困境形成的直接原因。主体身份模糊导致社会责任与伦理义务不足,异质性交叉的僵化导致整合性交流的不足,社会向上流动机制的低效,“哑铃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导致中间阶层力量过弱,文化价值观念与现实社会制度的断裂等导致我国当前的伦理困境。伦理困境的消解需要构建社会主体的多重

身份参数,将主体性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要搭建异质性交叉平台,促进伦理共识的形成;培育“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打造伦理冲突的缓冲区;畅通不同群体的流动渠道,软化社会阶层结构;构建共享性的核心价值观,消弭伦理观念的边界。

新时代焦裕禄家风的价值阐释

秦法跃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撰文指出,“家风”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承载方式,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脉络,也具有强大的时代阐发价值。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其党性修养、理想信念、道德操守等在家庭治理中的集中投射。焦裕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杰出代表,焦裕禄精神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卓越诠释。焦裕禄家风是焦裕禄精神的文化绵延和价值折射。在焦裕禄成长与工作的磨砺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劳动、勤俭、不搞特殊化”为特质的朴素家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的当下,系统深入研究、开发与弘扬焦裕禄家风具有修养党性的精神价值、教导子女的教化价值和凝聚民心的社会价值。

县级融媒体中心动力机制、结构性困境与自我超越

张世海,郑坤在《中国出版》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承担政府的社会沟通、社会凝聚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市场化专业团队的运营指导、县级党政机关的鼎力支持和县级媒体领导层的探索创新。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在五个方面超越结构性困境:改革僵化的党政新闻报道模式,创新舆论监督;以在地化方式宣传政府的理念,融入当地知识体系;减少人才流失,探索新的人才聘用体制;基本技术规范统一,运营模式多样化;与民营新媒体合作,共建心灵家园。

农户认知、政策信任与教育扶贫清单执行绩效

陈浩天,蔡丽丽在《教育与经济》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教育扶贫清单的政策执行绩效受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类型以及政策信任等多重影响。具体而言,女性对扶贫清单的满意度高于男性,教育扶贫政策执行绩效满意度不会随农户年龄增大而提高。与兼业户相比,纯农业户对教育扶贫清单执行的满意度较高。教育水平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的贫困农户对教育扶贫清单政策执行越满意。家庭收入、教育支出和健康状况三个变量对教育扶贫清单的执行均不具有显著影响,该结果凸显了贫困农户对教育投资的刚性需求和脱贫理性。在教育扶贫清单信任变量中,教育扶贫清单的执行主体、过程与结果均对扶贫效果影响较大。从教育扶贫清单的内容看,农户对资金助学政策的评价较为满意,对技术培训以及职业教育政策的需求意愿较为强烈。因此,要不断拓展教育资源配置精准化的公共性价值,提升农户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对教育扶贫清单的运作绩效进行精准监测和及时回应。

应对“网络民粹主义”消极影响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引导策略

崔聪,张励仁在《理论导刊》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在网络新媒体赋权和“互惠性”利益诉求驱动下,“网络民粹主义”持续滋长,并且耦合其它社会思潮衍变新形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仇视精英、解构权威,造成社会分化和对政治国家的“拒斥性认同”,割裂了爱国主义的“整体之爱”;形塑想象的“中心地区”,排斥“他者”和“他国”,生成“狭隘和盲从”的爱国主义;侧重问题批判,只破不立,煽动群体非理性激情,阻碍爱国主义美德的适度表达。对此,必须把握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净化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网络空间环境,正视普通民众权益诉求,并且借助规范性力量,引导爱国主义的理性回归。